

正確的黨史從哪裏來？

• 塞 奇 (Tony Saich)

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1941-1944)一向被認為是為黨員確立新正統觀念的關鍵時期。毛澤東及其思想在中國共產黨內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通過構造一種將毛澤東置於中國革命運動之中心的黨史而達到的。

本文將集中討論毛主義話語創作中的這一舉足輕重的方面。黨的高級幹部學習黨史，要先於涉及面更為廣泛的整風運動；而當整風運動的特定目的確立之後，回到黨史與「路線」的學習與研究，又是整風運動的高潮。這一總結階段的頂點是1945年4月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本文的着眼點在於黨史在整風運動中的作用：毛主義的歷史是怎樣構造出來的，這個歷史是怎樣通過利用具體的材料，以及它是怎樣在運動進入總結階段之前的幾個學習階段而得到普及。

黨史與整風運動

當毛澤東和其他長征的倖存者到達延安與當地的共產黨人會合之時，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正陷入絕境。他們不僅遭到國民黨的圍追堵截，而且其內部也四分五裂。倖存似乎就是很大的勝利了。然而，在一個很短的時期過去之後，毛澤東就開始着手從似乎混亂和無序的狀態之中創造出秩序。他清醒地意識到黨需要一套指導思想，以重新喚起大多數黨員的忠誠。

* 本文原文很長，譯成中文達三萬餘字，有註釋137個。因篇幅限制，中譯文有很大的刪節，許多細節刪去，但主要的論點和論據均保留下來。該文英文將在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1993)一書中刊出。在此感謝塞奇先生應允先期發表該文的中譯摘要。

種種理由使毛確信需要有這樣一種統一的思想架構。首先，除了陝、甘、寧邊區以外，共產黨控制的其他根據地都處於日本侵略者的壓力之下。為了抵抗這種壓力，並防禦國民黨日後可能的侵犯，確保黨和軍隊的緊密團結是十分必要的。第二，自抗日戰爭爆發以來，黨員人數的急劇擴充本身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奔赴延安，與其說是受到了馬列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組織的吸引，毋寧說是出於愛國熱情。抗日戰爭頭幾年裏的「突擊入黨」，使得許多人沒有經過審查就進入黨內。毛澤東及其支持者感到，在這些新黨員中，有很多人並沒有很好地掌握「中國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或者並不清楚黨的最終目的。這種狀況強化了如下的想法：如果要使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統一的戰鬥力量，某種程度的正統意識形態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3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特點是殘酷的內部鬥爭，間或演成自相殘殺。如果能夠說服大多數黨員，使他們在新的正統的指導之下重新振作起來，黨內這種激烈鬥爭的危險就會大大減少。

然而，這並沒有解釋為甚麼提出一個「正確的」黨史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一種必要的解釋既可以在統治的合法性之中，也可以在毛澤東與王明的權力鬥爭中找到。事實上，當時王明在政治上已經敗北，第三國際也已確認了毛澤東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因此，當毛澤東試圖構造一個黨史，使王明及其30年代的政治路線名譽掃地之時，王明實際上已不再是中共黨內的一個真正的競爭者。毛主席黨史的構造還有一個更為深遠的目的。它的意旨並不在於整理和重述過去。通過讓自己成為中共革命史的中心人物，毛澤東要為自己提供一種合法性的基礎，對於確保其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這一點是必不可少的。

施拉姆曾經注意到，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的必備資格之一就是具有理論家和哲學家的聲望^①。正是在這一方面，王明構成了對毛的威脅。一般認為，與毛和其他任何人相比，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王明是更為重要的理論家。事實上，在毛澤東發動對黨史的重新評價之前，王明的《兩條路線》是最重要的官方讀物^②。對於毛而言，為了確立他自己的領導地位，攻擊王明的理論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毛澤東給王明貼上「教條主義者」的標籤，指出他是從書本上而不是從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得出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反，毛澤東聲稱自己是將馬列主義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在1938年10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主張：「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書面語言始終是非常重要的。各朝正史構成了統治結構和統治權力的重要部分。每個朝代都會總結過去，使之符合現時的要求。對歷朝興衰所做的評論是道德方面的，它們為統治者提供實質性的指南。毛主席的黨史就像明史的翻版。兩者都無意對過去作出學術上的總結，而只有自覺的政治目的。正如歷史學家弗蘭克(W. Franke)所注意到的，主持編史的翰林學士常常捲入政治爭論之中，構造出反映己方而非對手之觀點的種種「歷史」^③。

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的必備資格之一就是具有理論家和哲學家的聲望。正是在這一方面，王明構成了對毛的威脅。在毛澤東發動對黨史的重新評價之前，王明的《兩條路線》是最重要的官方讀物。

如果這種傳統的偏好還不够的話，那麼斯大林主義官方蘇共黨史在1938年的公開發表必定使毛確信：對於一個統治者而言，這是正確的作法。斯大林主義的蘇共黨史受到毛澤東個人的讚揚，其「結束語」包含在整風運動的22個重點學習文件之中。

通過創造一套用來分析中國革命的話語術語，毛澤東構造了必不可少的「符號資本」以加強他作為最高革命領袖和解釋者的地位^④。他把表面上的失敗解釋為無情推進的歷史過程中之暫時挫折的能力，以及他理解迅速變化中的世界的的能力，必定能夠消除其他黨政幹部的疑慮。它提供了一種能夠結束中共黨內自相殘殺的思想邏輯和秩序。

然而，構造一個「正確的」黨史比為黨員提供一種指導思想體系有更多的事要做。它打算結束運動中其他幾種可供選擇的話語。不同意毛主義的黨史觀就等於犯了「路線」錯誤。整風不只是一個和平改變政治信仰的運動，而且必須根除其他的挑戰，不論這種挑戰是來自王明及其支持者，還是來自那些代表了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構造「正確的」黨史，並以此為基礎推出作為整風運動之指南的毛澤東思想，掩飾了追求最高權力的「冷酷無情的」毛澤東。這種單一話語的創造，排除了觀念多元化的可能性。

在延安發生的兩個事件使這一點變得一目了然。第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中指出，從五四運動以來發展起來的知識分子獨立批評作風，在他的共和國中是不能容忍的。倘若誰無視這一告誡，王實味的受辱就是一個警告。

第二，1943年，中共把審幹運動與整風聯繫起來。嚴酷的審幹自然會令那些敢於公開向毛澤東挑戰的人再一次領略到被指控為叛徒或特務的恐懼。

毛主義黨史的發展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政治上擊敗王明之後，開始鞏固對權力的所有權。他提出要發展一種為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具有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其中的一個重要性內容就是要學習中國的歷史遺產，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加以批判的總結。在涉及黨史時，毛澤東提到，遵義會議糾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嚴重錯誤。

1939年10月，毛澤東開始進一步表明其批判的矛頭所向。在回顧黨史時，毛澤東宣稱，遵義會議使黨走上了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這標誌着通過重新解釋黨史來攻擊王明及其支持者的開始。當時，黨的官方觀點仍然宣稱：王明及其支持者促成了黨的布爾什維克化，這是六屆四中全會的結果。

這時，毛澤東接受了劉少奇關於中共中央在蘇維埃革命戰爭以及在「白區」工作中存在許多「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批評。劉少奇的批評始於1937年3月4日，當時他給中共中央發出一封信，基於其「白區」工作的經驗以及統一戰線政策的執行情況，抨擊中央從八七會議以來一直犯有「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劉的意見遭到博古和張聞天的拒絕^⑤。在1939年之前，毛澤東從未公開支持過劉少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各朝正史構成了統治結構和統治權力的重要部分。每個朝代都會總結過去，使之符合現時的要求。對歷朝興衰所做的評論是道德方面的，它們為統治者提供實質性的指南。毛主義的黨史就像明史的翻版。兩者都無意對過去作出學術上的總結。

奇的這一觀點，現在毛澤東察覺到這一立場的有用之處。可是，毛必須保證受到指責的是當時的黨中央，而不是在江西蘇維埃的「地方」領導。因此，當劉少奇舊話重提時^⑥，毛劉兩人——一個是蘇維埃地區黨的地方領導，另一個是「白區」的領導——之間的聯盟形成了。

1940年底，毛澤東在一項黨內指示中再次強調要對江西蘇區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批判。然而，儘管這項指示為黨中央通過，但有關王明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提法受到抵制^⑦。

翌年五月，毛澤東向中共的高級幹部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講話。他突出強調了需要學習的三個方面：現狀、歷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革命工作中的實際運用。最後一點問題最大。在毛看來，特別在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上，那些回國的留學生以及中高級幹部最容易受「主觀主義觀點」的影響。這一批評顯然是針對王明及其支持者的。然而，當時，人們對毛的觀點仍然有抵觸。但這一講話已經產生了它的影響。

在1941年9月1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把促使加強學習和構造新黨史的多種因素融合在一起。這個會議標誌着整風運動的正式開展。在此次會議上，有兩個問題引起爭議：第一，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第二，甚麼是關於1927年至1937年間黨史和「政治路線」的正確解釋。就後者而言，爭論的焦點在於：「路線」錯誤是否是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發生的。起初，大多數與會者對這一說法有所懷疑。但是，毛澤東和黨內的其他大人物（如王稼祥、任弼時）紛紛出面論證，這對搖擺不定的與會者產生了影響。王稼祥指出，毛澤東在蘇區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而劉少奇則在「白區」堅持了這一觀點。王稼祥的發言加強了毛和劉的結盟。同時，王還批評了黨內的「主觀主義」。他將「主觀主義」委過於那些「學了一點理論」但無實際工作經驗的人^⑧。

在1941年9月1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爭論的焦點在於：「路線」錯誤是否是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發生的。大多數與會者對這一說法有所懷疑。毛澤東和黨內的其他大人物紛紛出面論證，這對搖擺不定的與會者產生了影響。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認為，王明及其支持者促成了黨的布爾什維克化。



這次會議對過去的30年作了三項從未公開的決議：第一，從四中全會到1931年9月，黨中央的政治路線雖然有不少嚴重的錯誤，但基本上是正確的；第二，從九一八事變到遵義會議，黨中央執行了一條錯誤路線；第三，遵義會議之後，錯誤路線得到了糾正^⑨。毫不奇怪，王明反對這一評價，他繼續聲稱四中全會的路線是正確的。如果在具體工作中，尤其是在江西蘇區後期的工作中有甚麼錯誤的話，王明認為應由博古負責。

毛主義黨史的普及

儘管存在着小的分歧，但總體來說，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澤東關於黨的「路線」是非的提法，構造毛主義黨史的工作也列入了工作日程，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使之普及，使高級幹部確信其真實性。這一點並不容易做到，因為許多高級幹部親歷了這段歷史，他們也會感到，重新評價過去的歷史對自己也是一個威脅。

普及毛主義黨史的組織技術後來成為中共歷次思想政治運動的法寶。第一步是由高級領導人規定關於有關事件的「正確」提法以及整個運動的內容；第二步是指定一批學習文件和材料；第三步是確定學習的計劃，使之有組織、分階段地進行。在此過程中，小組學習和討論是整個運動的主要內容。在學習時期，主要領導人要做講話，黨刊要發表文章加以配合。學習小組的成員必須結合自己的切身經歷、通過對具體例子的思考來說明整個運動的意義所在。在此基礎上，個人要作出自我鑑定，其他人要提出批評意見。接受新的正統會使人產生一種輕鬆的感覺，即自信已經「通過審查」，而且進入了新的秩序之中。最後，運動進入總結階段，由上級領導人檢查運動的目標是否達到。那些接受「思想統一」的人受到表揚，而拒絕接受新路線的人或態度曖昧者則受到威嚇。

高崗領導的西北局在新黨史的發展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運動進入總結階段時，高崗拋出一份陝甘寧邊區史。這部歷史吸收了劉少奇對前黨中央的批評，並使之擴大到前十年整個蘇區的歷史。

供高級幹部學習的第一種主要材料是《聯共(布)黨史》。中共散發了它的《簡要讀本》。這部著作的出版標誌着斯大林主義在蘇聯政治中的勝利，其中譯本的問世則標誌着毛澤東迫使人們接受以黨的「正確」歷史為基礎的意識形態霸權的開始。任弼時參加了該中譯本的翻譯和出版社工作^⑩。中共把《簡要讀本》抬高為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俄國革命的具體道路相結合的典範，它被說成是反教條主義的樣板。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讚揚此書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

毛澤東自己則積極參與了整風學習材料的編輯工作。最重要的兩個學習材料是《六大以前》和《六大以來》，後者尤其重要。這些材料絕非無足輕重，後來一位研究者說，如果沒有這些材料解除各級幹部的思想武裝，並且幫助他們認識到他們的錯誤，學習討論不會進行得那樣順利^⑪。

普及毛主義黨史的組織技術後來成為中共歷次思想政治運動的法寶。接受新的正統會使人產生一種輕鬆的感覺，即自信已經「通過審查」，而且進入了新的秩序之中。那些接受「思想統一」的人受到表揚，而拒絕接受新路線的人或態度曖昧者則受到威嚇。

《聯共(布)黨史》出版標誌着斯大林主義在蘇聯政治中的勝利，其中譯本的問世則標誌着毛澤東迫使人們接受以黨的「正確」歷史為基礎的意識形態霸權的開始。

事實上，嚴肅的幹部學習早在1939年5月就已開始。到1941年5月，已有2118名中共幹部參加了在延安舉行的這個學習^⑫。之後，這個學習的範圍又逐漸擴展。

三個多月之後，中共重新部署了高級幹部的學習。9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佈了組織高級幹部學習的決定，並建立了指導整個學習工作的中央學習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⑬。10月4日，毛澤東和王稼祥代表中央學習組要求高級幹部學習組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學完第三國際的政治報告以及《六大以來》中的所有文件。幾天後，中共中央書記處設立了「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該委員會以毛澤東為首，包括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和彭真。重寫黨史的意圖愈來愈明顯。委員會委託王稼祥起草了一份〈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的文件，該文件經過了多次修改，它的許多評價為最後的〈決議〉所採納。

無論中央還是地方的學習組都使用同樣的方法。文件的學習和反思具體的事件相結合。定期總結以及書面或口頭的檢查也是其中重要的環節。譬如，西北局在1942年7月下旬進行了一次測驗，它要求中低級學習組成員必須就三個問題進行檢查：第一，學習整風文件是否使他們認識到其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第二，對主觀主義是否有所認識；第三，他們怎樣看待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如何克服這些缺點和錯誤。政治局要求把這些總結編好上報，並指示說，這些報告應該指出學習表現最好和最壞的組織和個人。

在最後的總結階段，上述程序大同小異地重複一遍。幹部必須作出自我批評。這種嚴格的自我反省引導一些人向上級黨組織匯報了一些其歷史上或思想上從未向人透露過的事情。

黨史學習與黨內整風運動的擴大

毛澤東的新黨史觀並沒有立即為高級幹部所接受。許多人是這個歷史的一部分，他們或許覺得事情不是這樣，或許感到對於歷史的否定性解釋會給他們帶來不利。事實上，蘇聯那些被排斥在歷史之外的人的悲慘下場，使中共的幹部擔心重寫黨史會導致政治迫害。

然而，黨史一直是小組學習的重要主題。毛澤東清楚地認識到學習和研究黨史對於現在的重要性。1942年3月，毛澤東曾在中央學習組做了一個報告。他建議把黨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建黨到1927年，以反對北洋軍閥為特徵；第二個階段是反對國民黨；第三個階段則是反對日本人和汪精衛。陳獨秀在第一個階段的後半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從1931年9月到遵義會議則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期^⑭。

在整個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得到了中共西北局及其關鍵人物高崗的有力支持。從一開始，毛澤東就讚揚高崗對於地方情況的瞭解。從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共政治局召開了一系列高級幹部會議。會議有意識地採用討論和清算黨史的方法來糾正當前的問題。高崗在這次會議上做了報告，這份報告為構

無論中央還是地方的學習組都使用同樣的方法。文件的學習和反思具體的事件相結合。定期總結以及書面或口頭的檢查也是其中重要的環節。在最後的總結階段，幹部必須作出自我批評。這種嚴格的自我反省引導一些人向上級黨組織匯報了一些其歷史上或思想上從未向人透露過的事情。

毛澤東的新黨史觀並沒有立即為高級幹部所接受。許多人是這個歷史的一部分，他們或許覺得事情不是這樣，或許感到對於歷史的否定性解釋會給他們帶來不利。

造全黨「正確的」歷史鋪平了道路。在會議閉幕之際，《解放日報》在第一版上給予讚美，着重強調這次會議解決了邊區的黨史問題。無論如何，高崗的做法成為修改黨史這一具體任務的樣板。

高崗同毛澤東結成政治上的聯盟並不令人奇怪。在30年代早期和中期，高崗和劉志丹等地方上的領導人同在江西蘇區的毛澤東處於同樣的地位。高和劉同當時黨中央的特使郭洪濤和朱理治發生了衝突，後者試圖強迫他們改變其游擊戰術並使他們處於中央更加嚴密的控制之下。1935年夏，中共地方黨和軍事組織改組，地方的同志遭到排擠和清洗。許多人被關押起來，其中包括高和劉。這次衝突達到了劍拔弩張的程度。後來，當毛和其他長征的倖存者到達陝北，高和劉才被放出來。

因此，高崗在一系列講話中力圖證明他以前的政策的正確性，並貶低黨代表的政策。他指責郭和朱在1935年以前是「左」傾機會主義，而在統一戰線建立之後是右傾機會主義^⑤。這樣一來，高崗製造出的陝甘寧邊區史就同毛澤東在江西的切身經驗有了某種利益的一致性。由於西北局是中共黨內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所以毛澤東能夠順利地推行他的整風政策。

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二週年紀念日為公開樹立毛澤東的個人形象並修改黨史以宣揚他在中共歷史中所發揮的中心和正確作用提供了機會。1943年7月6日，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思想」，為毛澤東發起的意識形態攻勢造勢。

劉少奇抨擊了他所謂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即「孟什維克」)，讚揚所謂的「真馬克思主義者」(即「布爾什維克」)。他呼籲拿出對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來根除孟什維克分子的影響。某些人只注重學習外國革命經驗的傾向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他列舉了陳獨秀、彭述之和中國的托洛斯基分子、李立三路線、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以及教條主義這樣一些反面例子。他要求對中國革命的經驗做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概括，來取代那些錯誤的傾向。毛澤東是這一過程的中心，他的「指導思想」必須貫徹到所有的工作環節和部門之中。未來的任務就是要「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經驗，並用這些經驗來教育我們的幹部和黨員。」劉少奇以頌揚的口吻把毛澤東置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核心。他聲稱，所有黨員都應該「同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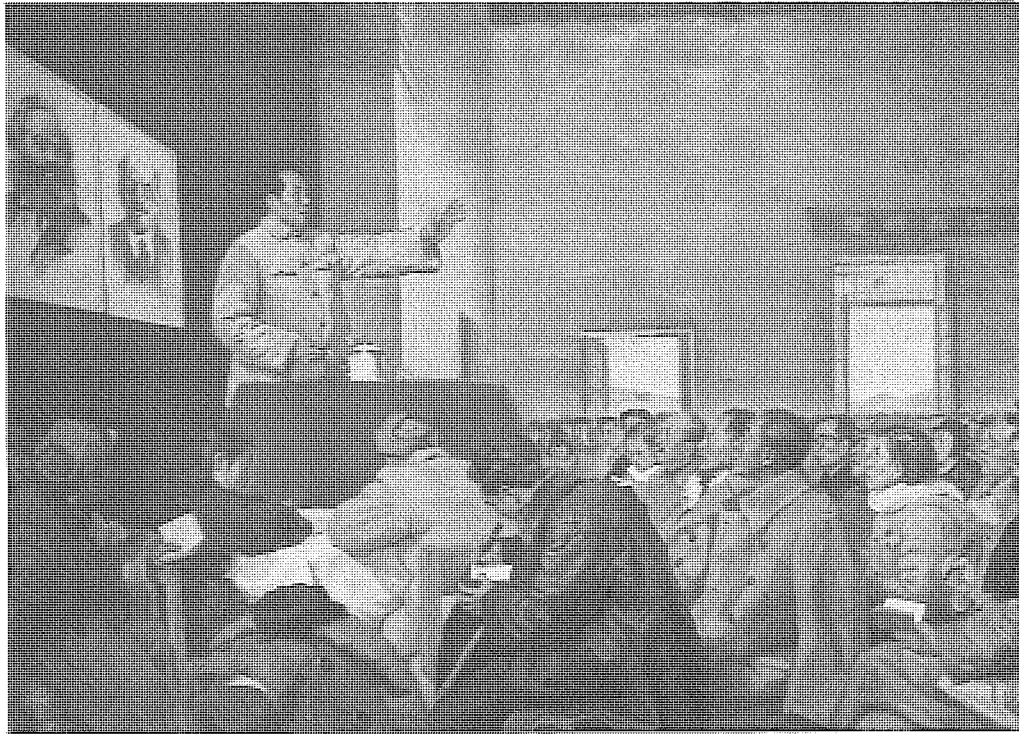
既然毛澤東已被置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核心舞臺，餘下的問題就是準確地確定這一歷史的面貌。

毛主義黨史創作的最後階段

構造新黨史運動之最後階段的關鍵性標誌是1943年9月上旬至10月下旬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批評了王明在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高崗製造出的陝甘寧邊區史就同毛澤東在江西的切身經驗有了某種利益的一致性。由於西北局是中共黨內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所以毛澤東能夠順利地推行他的整風政策。

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黨員確立新的正統觀念的關鍵時期，毛主義黨史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在此期間，劉少奇拋出了一份對王明著作〈兩條路線——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詳盡批判。劉少奇指出，就路線而言，王明在許多方面比李立三更「左」一些，而且王明在四中全會以前反對李立三的鬥爭方法屬小組組織宗派活動，違背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給黨的事業帶來了莫大的危害。劉認為，這種不正確的鬥爭方法和李立三的「左」傾錯誤為羅章龍的派別活動創造了基礎，把「許多好同志引上了歧途」。在他看來，四中全會本身是由王明及其代理人籌備、操縱和把持的，他們用第三國際的名義以達一己之目的。劉少奇把四中全會看成是黨的危機的開始¹⁶。

10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高級幹部應再次學習黨史和黨的路線。為了配合這次學習，中共中央書記處編輯了一個有針對性的文件集《兩條路線》。這不同於王明的那本書，它是由《六大以前》和《六大以來》兩本文集改編而成，特別突出了所謂「路線」問題。同時，中共中央還下發了一些由專門人員撰寫的文章，概述關於各個階段黨史的正確觀點以及如何運用討論會來「統一思想」。

周恩來斷言，六大的〈決議〉包含了一些基本的錯誤，例如未能認識到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未能加強黨的建設並建立紅色政權。而正是在這些問題上，周恩來強調毛澤東曾提出過正確的主張。

在此之後，中共主要領導人開始發表講話，提出日後〈決議〉的基本架構。除劉少奇的貢獻之外，其他人也積極參與其事。周恩來的貢獻是清理總結了20年代的「路線」和正確政策的問題。他通過兩次講話完成了這一貢獻。第一次是在1943年春，他就1924年至1926年期間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發表講話。他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認為這一錯誤使得蔣介石得以鞏固其政治和軍事地位，並妨礙了中國共產黨恢復在統一戰線中的主動權。極為突出的是，周在講話中頌揚毛澤東選擇了正確的政策。據說毛澤東是黨內認識到五卅運動的結果應促使中國革命向農民革命戰爭轉變的「代表」。

周恩來的第二次講話發表於1944年4月3、4兩日，涉及中共六大，意在澄清關鍵性問題。周斷言，六大的〈決議〉包含了一些基本的錯誤，例如未能認識到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未能加強黨的建設並建立紅色政權。而正是在這些問題

上，周恩來強調毛澤東曾提出過正確的主張。同時，周認為整風的關鍵就是要以分析的眼光來批評六大前後黨內的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①。

其他人也有類似的舉措。例如王若飛曾談及1924年至1927年間的一些事情。張聞天曾建議陸定一做一次關於遵義會議的報告，他本人則指示下發有關遵義會議的一些材料，從中人們可以看到博古、李德同毛澤東、王稼祥以及張本人在觀點上的分歧，從而使毛主義的黨史更具有說服力。

同時，中共還根據原根據地的劃分組織了一系列的討論會。討論的焦點集中在1931年至1935年的蘇區工作，其目的是使人們將中央提出的有關提法同每個地區聯繫起來，使幹部們能夠從切身的經驗中領會直至全面接受新的黨史。譬如，在紅七軍舉行的有關會議上，鄧發作了簡要的發言，這一發言完全仿效了毛澤東的方法和觀點^②。

在總結階段，重新評價黨史的針對目標顯然是王明和博古。早在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便下達了一項指示，要求研究王明和博古的「宗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研究人員限於來自各分局下屬地區較為適宜的一、二百人，名單由中央局或各分局確定。學習的內容主要是文件集《兩條路線》。這一輪學習和研究據說標誌着「整風的深入」和進入高級階段，並為黨的七大決議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③。

在同一天下達的另一項指示中，中共中央政治局為這次研究學習定下基調。指示提出，黨的真正「布爾什維克化」要以批評王明、博古和其他機會主義者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為出發點。它批評王明等人在四中全會上有篡黨行為，其影響直至遵義會議之後才得以克服。指示指出，在黨的七大決議發表之前，中央各局領導機關的高級幹部以及各大區的黨委應該討論王明和博古在30年代早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損失。據指示的估計，這一損失在「白區」達百分之百，在蘇區達百分之九十。

這項指示還涉及到王明近期的錯誤。據說王明及其支持者利用黨的長江局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六中全會期間有「反黨」活動，即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主義路線。這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反對持久戰，主張速決戰；反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迷信國民黨；反對游擊戰，主張運動戰。王明還被指責為企圖在武漢建立第二中央，破壞黨的紀律^④。

雖然當時第三國際已經解散，但它的名字依然被用來指控王明。王明和博古被說成是第三國際路線的反對者。按照指示的觀點，黨中央在遵義會議之後執行了一條完全正確的路線。指示最後說，除了王明和博古以外，黨中央的領導同志都團結在毛澤東的周圍。這一點暗示，反對毛澤東的路線不僅是不正確的，而且還是孤立的。

雖然當時第三國際已經解散，但它的名字依然被用來指控王明。王明和博古被說成是第三國際路線的反對者。指示最後說，除了王明和博古以外，黨中央的領導同志都團結在毛澤東的周圍。這一點暗示，反對毛澤東的路線不僅是不正確的，而且還是孤立的。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與通過

緊張的冬季討論過去了。毛澤東在1944年4月12日發表了題為〈學習與時局〉的總結性講話，他的評論為七大的〈決議〉打下了基礎。然而，同以往不同

的是，毛澤東在批評王明等人時承認他們在四大全會上的領導地位是合法確立的。這似乎看起來否定了上年11月那項指示中的觀點，但其深意是向王明等人做出保證，即他們不會因被指控反黨而受到嚴厲的懲處。這必然會使那些受批評者消除會遭受斯大林敗將式遭遇的擔心。同時，毛澤東再次肯定了遵義會議的路線，並指出從1935年到1937年黨開展了克服「左」傾偏向的鬥爭，而此後到1940年則是反對「右傾偏向」的鬥爭時期，但從1941年到1944年，主要的問題又成了「過左的偏向」。毛澤東在講話中最後提到，政治局首先關心回顧遵義會議以前的歷史，至於遵義會議以後的歷史，則留待以後討論。

194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組織一個委員會起草關於黨史問題的〈決議〉。受到任命的有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和任弼時。委員會的工作主要由任弼時負責。5月19日，該委員會加進了博古，胡喬木參加協助工作。1944年下半年，在任弼時的指導下，〈決議〉大約易稿十四遍。任弼時在起草過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這一點得到了當時在延安的蘇聯人弗拉基米洛夫之回憶的進一步證實。他寫道，任弼時向六屆七中全會所作的題為〈論1931年到1935年黨的政治路線〉的報告草案構成了最後〈決議〉的底本。弗拉基米洛夫認為，任的報告草案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雖然〈決議〉以報告草案為基礎，但最後的定稿本有很大的改動^②。

〈決議〉的定稿本於1945年4月20日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決議〉只分析了遵義會議之前的黨史，同毛澤東在1944年4月12日的講話有所不同，它沒有大膽地對以後的歷史事件提出看法。王明和博古第一次在這樣的官方文件中被稱為領導了錯誤路線的「兩個教條主義分子」。

進行了歷史的回顧之後，〈決議〉批判了王明及其支持者的政治、軍事、組織和思想路線，並指出其錯誤的思想根源在於主觀主義和黨八股，錯誤的形式則是教條主義。在政治上，他們被說成是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不同階段的界限。這就是說，他們一方面低估了農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常常主張反對包括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整個資產階級。在軍事上，他們被說成拒絕游擊戰作為有益於區域戰爭的正確形式。同時，「左傾」路線還被說成是形成了脫離黨內外群眾的宗派主義^②。

這樣一來，〈決議〉證明了在30年代黨處於危急關頭的幾年中，毛澤東的原則和路線是正確的。它也鞏固了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聯盟。毛澤東在蘇區的路線受到讚揚，而劉少奇則被譽為「白區」工作的模範。這表明劉少奇八年前對王明路線的批評是正確的。

在王明表示接受後，〈決議〉經過表決通過了。作為起草委員會的一員，博古大概早已接受了〈決議〉的結論。王明由於生病沒有參加歷次討論，但〈決議〉草案曾三次送他細閱。此外，七中全會主席團的成員還與他進行談話。最後，王明致函全會接受〈決議〉，並表示已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他尤其接受對其著《兩條路線》中含有「左」傾錯誤的批評。這個態度對於顯示毛澤東的全面勝利、以及讓其他黨員明白黨內確實達到了高度統一，是很重要的。這種統一完全基於毛澤東及其支持者開出的條件。王明得到的獎勵是同博古一道被選為中共七大中央委員會委員。

〈決議〉證明了在30年代黨處於危急關頭的幾年中，毛澤東的原則和路線是正確的。它也鞏固了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聯盟。毛澤東在蘇區的路線受到讚揚，而劉少奇則被譽為「白區」工作的模範。

結 論

這篇論文論證了毛主席黨史的構造是延安整風運動中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精心製作一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史，是建立毛統治全黨之合法性的關鍵。這個歷史本身並非由毛澤東首創，但是，一旦打算在延安創立新的正統觀念，他便立刻看到了它的價值。〈決議〉的寫作意在侵削任何潛在的競爭者的地位，同時也是毛澤東、劉少奇和高崗結盟的一個政治過程。與蘇共黨史的《簡要讀本》不同，毛主席的黨史並沒有覆蓋整個黨史，也沒有把毛澤東置於黨史中每一個事件的中心。大概親歷過的人太多，使得這種做法無法行得通。王明和博古公開接受〈決議〉的結論已經足矣。沒有必要再進行黨內的政治迫害。新黨史的促成過程包含了一些因素，日後成為毛主席式運動的一成不變的特色：緊張的學習之後便是總結階段，這時每個人的思想、態度和行為均要受到評議。

整風運動和黨的官方歷史的撰寫，為建立穩定的、統一的領導班子提供了基礎。這一點對於一個列寧主義式的先鋒隊黨是必不可少的。這種統一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論而是建立在某種毛覺得適合中國的現實而且能為黨的幹部提供行動指南的東西上面。作為歷史的正確解釋者，毛澤東的核心角色確保黨承認他是最有資格制定未來政策的人。

與蘇共黨史的《簡要讀本》不同，新黨史的促成過程包含了一些因素，日後成為毛主席式運動的一成不變的特色：緊張的學習之後便是總結階段，這時每個人的思想、態度和行為均要受到評議。

註釋

①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62.

② 王明的這個小冊子初版於1931年，翌年在莫斯科重印。在學習黨史的運動中，王明在延安重新發表了這本書（1940年3月），更題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

③ W. Franke, "Historical Writing during the Ming", in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nis Twitchett (ed.),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XVII,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43-44.

④ 關於「符號資本」的概念，參見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and *In Other Word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David Apter把這一理論運用於毛澤東以及延安的研究，參見其論文："Discourse as Power: Yan'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1993) and "Mao's Republic", in *Social Research*, Vol. LIV, No. 4, 1987, pp. 697-729.

⑤ 劉少奇的信題為〈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載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第一卷，頁803-12。事實上，早在1936年4月，劉少奇就開始提出「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問題。參見其〈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冒險主義〉，原載於《火線》第55期（1936年4月10日），重印於《六大以來》第一卷，頁754-59。張聞天的反駁，參見其〈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任務（提綱）〉（1937年5月2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卷，頁201-205；以及洛甫，〈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出版社，沒有日期），頁1-21。

- ⑥ 劉少奇在1939年10月20日發表講話，題為〈論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載《六大以來》第二卷，頁215-17。
- ⑦ 毛澤東的指示題為〈論政策〉，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關於這一指示的情況，可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編寫組編：《延安整風運動紀事》（北京：求實出版社，1984），頁45。
- ⑧ 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領導為中心〉，載《王稼祥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頁326。
- ⑨ 毛澤東和王稼祥1942年2月21日給周恩來的電報，載《文獻與研究》1984年第十九期。亦可見張靜如等：《中共黨史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頁67。
- ⑩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研究組編：《任弼時研究文集》（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頁184。
- ⑪ 龐獻之：〈關於黨的文獻編輯工作的幾個問題〉，載《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三期。
- ⑫ 張靜如等，前引書，頁64-65。
- ⑬ 〈中央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卷11，頁743。
- ⑭ 毛澤東：〈如何研究黨史〉，1942年3月30日，載《黨史資料徵集通訊》1985年第一期，頁1-8。
- ⑮ 關於邊區黨史以及高尚的講話，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296-307。
- ⑯ 《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422-23。
- ⑰ 周恩來的兩次講話均可在《周恩來選集》中找到。
- ⑱ 《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445。
- ⑲ 這一指示的全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王明、博古宗派主義路線錯誤的指示」，載《延安整風運動（資料選集）》（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4），頁122-23。
- ⑳ 這一指示的全稱為〈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載同上，頁124-26。
- ㉑ P.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45* (New York: Double Day, 1975), pp. 374, 389-95.
- ㉒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載《六大以來》，頁1179-1200。

李西 譯
顧昕 編校

塞 奇（Anthony James Saich，又名Tony Saich。）1953年出生於英國倫敦。1986年在荷蘭萊頓大學獲博士學位。現為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教授和院長。主要著作有《中國的政治與政府》（1981）、《中國八十年代的科學政策》（1989）、《中國第一次統一戰線的起源——斯內夫利特（即馬林）的作用》（兩卷本，1991），並編有（或合編）論文集《中國的民衆運動——一九八九年之春透視》（1990）、《中國的十年改革》（1992）。現正撰寫一部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著作。